

五四之后如何回看工学联盟？ 在思想与实践辩证中 “干”出来的革命

刘璧嘉 (LALA) / 文 2019/5/6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



思想與運動的交匯處
WWW.REIGNITEPRESS.COM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

2019/5/3

〈五四一代人的“爱国”，你我真懂吗？〉
〈到底谁是“新”儒家？——论五四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
〈五四青年給今日“不激進青年”的一個大抱抱〉

2019/5/4

〈五四青年的工学实践〉
〈五四一百年，民主路何其遥远？〉

2019/5/6

〈革命中失落的遗产：五四中的女性解放〉
〈五四之后如何回看工学联盟？
——在思想与实践辩证中“干”出来的革命〉



更多專輯文章請見 WWW.REIGNITEPRESS.COM

编案

“怀火”是一个致力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台。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怀火”的青年作者在重新阅读五四历史、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下的思考与社会运动，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文化与精神现状。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方宣讲、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拯救”出来，让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面向获得对当下的启发。

“五四一百周年×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推出：

#愛國主義#：从五四时期“爱国主义”作为回应被问题化的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探讨彼时“爱国主义”的丰富意涵及其当下的扭曲；

#新儒家#：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中西文化、民主与政治的论述基础上，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兴；

#青年#：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角色的脉络出发，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背面”为资源，寻找今日“不激进青年”政治化的契机；

#工学联盟#：学生在面对工人时，逐步透过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与工人相结合；

#女性主義#：当代对五四的回顾中对历史中性别议题的忽视，恰恰反应了女性解放是一个在今天都尚未完成的命题；

#民主#：从五四至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讨论今天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

“工学联盟如何可能”——即知识分子和工人凭什么走到一起——无论是在五四还是当代，在西方还是中国，一直都是一个革命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旨在梳理五四期间的工学联盟的思想与实践，希望激

活五四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使之成为今天无论是各国的运动者、知识分子或学生都可以参考的对象。

一、“悬浮的思想”

关于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运动，汪晖曾提出，尽管“许多深刻的思想命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但它们“是‘悬浮’在人们所处的实际生活状态之上的，它们它们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却难以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汪晖《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那么，我们又可以如何解释至今依然让人“震惊”的、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要追问的是，在五四各思想都在争夺阵地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思想在分途后夺目跑出，有一些则惨淡收场（譬如自由主义）。

汪晖固然给我们透视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端倪，但他的论述多是关于“五四启蒙运动”的、关于各种思想内部的逻辑及矛盾的，而不太论及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就当时人的身体感知而言，他们是同时活在“五四启蒙运动”及“五四社会运动”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既有思想的部分，也有行动的部分，他们既在写文章，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并且两者是互相推动的。五四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个运动，首先就表示了它不只是思想的，它还具备了实践的面向，而行动与意识之间是有辩证的关系的。正如Arif Dirlik所言：“……推论不只包括脱离现实的思想 and 反省的思维方式，它还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与政治实践……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显得过于薄弱。”

（Arif Dirlik《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把握这个辩证关系，可以有效地让我们理解作为五四启蒙思想一员的共产主

义，是如何在缺乏有力的思想体系的支撑底下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并且落实成具体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部拼装车是如何顺利上路的？”

这里涉及到理论问题，譬如中国共产主义是如何从五四启蒙思想的主旋律中抽取一些最大公因子并融会贯通——诸如对“民主”和“科学”的重新演绎。以及，如果说共产主义视工人为革命主体的话，当时的知识分子及学生是如何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但同时也是一个组织问题、生活问题：知识分子及学生运动是如何酝酿出以后的工人运动？搞文化运动的人为什么会“放下知识分子的习惯”，走进了大众里面，甚至投身工运，这里涉及到怎样的自我改造？事实上，“工学联盟如何可能”，无论是在五四还是当代，在西方还是中国，一直都是一个革命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文章旨在梳理五四期间的工学联盟实践，希望激活五四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使之成为今天无论是中西运动者、知识分子或学生都可以参考的对象。

二、“劳工神圣”：一个历史化的阅读理解

1918年1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这次瞩目的演讲使得“劳工神圣”的口号与“德先生”和“赛先生”齐名。在这次演讲中他说：“此次世界大战，协商过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蔡元培《劳工神圣》）

演讲虽然名为“劳工神圣”并且歌颂了劳动的价值，但其歌颂的原始动力不在于像共产主义那样聚焦在劳动的创造力。劳工之所以神圣，

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使得中国成为“战胜国”。要知道，中国并没有派兵参与战争，但却因为派遣了工人去修铁路被当作是参与，而这又使得中国因此跻身“战胜国”的行列，可以在西方之前平起平坐。因此，劳工之所以神圣，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华工，并且象征着在世界秩序中属于弱势的中国，而他们在此刻以战胜过的姿态“一雪前耻”。也就是说，劳工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民族解放及反帝国主义的光环。

尽管蔡元培肯认体力劳动以外的其他劳动，正如它所说的：“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蔡元培《劳工神圣》）但该劳动必须是以“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为前提，才是有价值的劳工、神圣的劳工。在为神圣的劳工的目的及服务对象作出界定以后，蔡元培继续从反面举例，说明了什么类型的人是“非劳工”：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劳工神圣》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劳工劳动的“目的”及服务对象也因此是断定该劳动是否神圣的关键，而非只是因为劳动本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蔡元培肯定了智力劳动，但提到某些官吏、商人及咨议时却没有把他们列入劳工的行列——因为他们是卖国营私的官吏；是操纵票价

的商人等。蔡元培甚至把他们和“凭借遗产的纨绔儿”并列，制造出一种他们都是“不劳而获”的画外音，并得出“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的结论。因此，卖国营私的官吏、操纵票价的商人及领干修的顾问咨议的劳动是否智力还是体力，根本就已经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的劳动在政治上不是“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因此也不是劳工。当劳工第一次以神圣之姿而不是蝼蚁之姿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位置，多于他们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三、从对劳工的政治位置到对经济位置的关注

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工人的参与注入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使得劳工的重要性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也是“经济上的”？这个要从具体的工学联盟的实践说起。

1. 罢工的威力与《新青年》“民主”论述的齐头并进

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并视为是共产主义思想摇篮的《新青年》是在1915年9月成立的。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这本刊物包含了一大票至今还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包括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

（science，科学）就是这本刊物一开始的主张。然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在宣传共产主义，而且，他们高举的民主也并非任何具体的对某种政治体制的追求。它非常抽象并且可以转化和引申，其引伸出来的思想也因此可以和本质的涵义有差距。而要了解它所引伸的动力，就要理解社会实践的面向。正如Arif Dirlik所言：“这个概念对于运动中不同的社会派别具有不同的涵义，随着运动的展开出现了互相矛盾的解

释，在其范畴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并且在变革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民主和一的问题。”（Arif Dirlik 《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譬如，一开始，对那些不想干涉“政治”的倡导者譬如胡适而言，民主讲的是思想的民主，“一种要求废除思想统治，而表现自由探索方式的自由开放思想。”（Jerome B. Grieder 《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而因此，会被这一种民主思想所感召的，首先是对思想有热诚的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和学生。

然而，自从1919年6月开始，当五四的火焰从学生层面不断扩大到上海的工人，而工人又选择了以罢工的方式响应学生，为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时，民主的涵义就改变了。罢工使得学生与知识分子切身地感受到了工人力量之巨大，工人以实际行动证实了他们在经济结构上的关键性以及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这让知识分子及学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不可不再把工人纳入考量。工人是什么性质、如何可以调动工人、工人在未来中是什么位置等都因此变成了具备迫切性及现实意义的真问题。《新青年》中的思想民主是在此时有了动力延伸成经济民主。正如Arif Dirlik所说：“它的结果是新的民主思想——‘经济民主’的产生，他对于那年夏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仅仅在几个月前，运动的思想领袖们还鲜少关心社会主义。”（Arif Dirlik 《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

2. 自由主义对政治的退避与离地 vs. 共产主义对现实的积极介入

工人透过实际地“干”出了罢工并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云云思想中跑出的解释之一。然而，稍微退一步，首先要问的或许是，为什么工人的参与没有被譬如自由主义者说成只是一种“国民”的参与？我们所理解的工人，不单是（跨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上的一个位置，同时也是是政治上的位置，五四工人参与运动对特点，不仅仅是提出针对其经济结构位置的要求，而是一个广泛的政治要求。他们反对的是不平等条约，是出于反帝爱国和民族荣辱。也就是说，除了工人所运用的抗争手段——罢工，是同步连接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要求，中国工人运动在其起点上，一直都是有更远大的政治抱负的。

所以为什么工人的参与会直接造就共产主义得胜跑出呢？如果我们同意汪晖的观察，即五四前期所展现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并列和混杂的局面的话，为什么对工人的参与没有被其他论述所消化或挪用淡化（譬如工人参与不过是“公民参与”），而是在五四后期演变成了共产主义成功占据了言论上风呢？我认为这个可以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说起——是自由主义者面对时局的含混、“软弱”和淡出，造就了共产主义的脱颖而出。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内在问题，以Jerome B. Grieder的话来说，那是“因为它在当时是被有机体排斥的移植物”，而它也一直找不到扎根的方法——不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实践上都无法落实扎根。“五四后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文化造就政治，而不是政治创造文化”。因此，自由主义者强调理性、批判、独立，想要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这使得自由主义者认为“文化价值观念被视为本质上是由个体根据个人的经验和理性的盘算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即文化价值观念本质上是私有的”（Jerome B. Grieder《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这样一厢情愿地将文化与政治脱钩的观念使得自由主义者和诸多政治行动划清界线，并试图把示威、游行、演讲、罢课罢工

等说成是“非政治”的活动，而这无疑是幼稚且脱离实际的，它不能回应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当所有人都为工人及学生的威力所震动，并且浸淫在一片战斗及胜利的气氛当中时，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主张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消极。譬如在1919年夏天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辩论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断言“政治”是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的，他们这种无法捕捉时代的期待的做法，使得他们到最后只能采取守势，以至没落。而与此相比，《新青年》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因为积极的介入政治并深入的探讨及延伸了思想民主的意义，而因此具备对现实的解释力并占了上风，从而成功获得了运动论述的主导权，使得“工人”作为革命主体日益鲜明，也为日后共产主义的胜出奠定了根基。

3. 工学联盟的具体实践

尽管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对知识分子及学生的参与不排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限定了自己的关注在知识分子或学生身上，“自由主义者不是企图通过参加当时的政府、或者又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参与’政治（狭义的），而是致力于使他们在整个社会上占据的‘专家’和开明批评家（教育家、学者、记者、医生、技术专家）的地位具有社会的和（在广义上）的政治的重要性。”（Jerome B. Grieder《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而共产主义因为认为革命的主体最根本的是劳动者，因此其关注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或学生身上。知识分子和学生必须重塑工学关系，才能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这个从五四开始，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特色与传统。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佳士学生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这也是对这一传统的承继。而这些传统往往也是伴随着具体的实践而产生的，实践与思想之间，一直都是辩证的关系。

知识分子及学生是透过具体的工学结合的实践与生活去稳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1919年3月，邓中夏带领一众北大学生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他们希望超越自己的狭小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圈子，透过到处演讲，把对启蒙的倡导充分地带入中国社会。组织上，他们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方针下，认为中国青年不但需要新思想，还需要新的社交习惯，因此着重鼓励学生参加并组织面向大众，特别是劳工的学生社团。情感上，他们具有对救亡政治强大的热诚。实践上，他们借用“乡约”的实践传统，跳过了自由主义者排斥政治的纠结，做到了落地及具体的实践。乡约指的是士大夫要走入民间以老师之姿教化大众。但这些学生则是取了“乡约”的形式但换走了里面知识分子绝对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注1]

也就是说，除了像贺照田所说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特别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认定他们身上负有确保这世界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与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是，当然就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姿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特别优位感”这种对放下身段以及对工人革命性的认定（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同时是时透过具体的实践“干”出来的。而这个认定在实践上也以互信的方法表达，消解了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作为“非革命主体”与工人之间的张力甚至敌对的可能。

当学生带着与民众（而绝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交流的意志，甚至是一种坚定的对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期盼乃至认定时，他们的演讲题目也因此会有所调整，变得更需要切中听众的生活经验。根据贺照田的说法，青年知识分子及学生“……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是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

更在这里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这种新的生活习惯，使得学生“在召唤、引导、组织这些阶级革命性的同时，致力发现、发明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撑、护持这些制度存在、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因而，五四运动提供了工学结合的基础（譬如长辛店俱乐部就既是学校也是工会），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方式，使得两者可以互相辩证，共产主义也因此掌握了自己的动力，成为了一项可以持续进行的运动。

四、总结

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在理论上的张力，在历史上不是透过坐着光“想”而可以超克的，更多的还要透过具体的“干”。但这个干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共产主义青年首先没有像当时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回避政治，其次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每个机会去显示共产主义思想的解释力，最后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分秒秒地沉浸在对自己的原罪和保守本质的怀疑或极端的自大及高高在上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完全地抛弃或肯定自己的感知（sensitivity），而是让自己的感知与工人的感知互动，透过走入工人之中，让自己和工人团体在生活上、情感上、政治上、思想上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学生与知识分子把一开始被看作只是属于具备政治位置的工人，带出他们在经济位置上的重要性。并成功把爱国、反帝、救亡等目标和无产阶级革命完美结合起来，从而召唤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即只有消除阶级压迫甚至消除阶级，才能使得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会再被跨国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所欺负。

一百年后的今天，左翼青年所要面对的挑战固然要比一百年前所严峻，譬如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可不会说不要介入政治的离地话。事实上，无论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官方论述都正学会如何在方方面面地介入并解释人们的生活经验。如果有什么是值得今天的左翼青年向五四青年学习的话，那就是一种想要介入一切的决心。而很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譬如佳士青年）具备这种介入的意志，并且真的走入了工人之中。尽管他们在手法或思想上不一是一步到位的成熟，但至少他们掌握了实践与思想来回辩证的方法，在这点上我们应该予以全力的支持。

如果说当年的工人阶级尚未成熟而因此学生需要调动工人各种非“唯经济”的感知面（譬如尽管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生都会学会如何协调以至于结合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今天在新工人阶级已经成型并走向历史舞台的当下，而工人所感受到的经济剥削越发赤裸时，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加强调动“经济”上的感知面，但同时谨记各种工人会因着不一样的性别、文化、残障、政治、工种经验而需要不是“唯经济”的调动。何谓完美的工学联盟毕竟没有“一招到底”的公式，生硬地想要复制手法而不去创新往往是听起来最有力但最骗人的芭乐口号。在实践与思想中来回辩证和切换，尽管听起来是摸着石头过河，却是一个比任何表面成果更需要肯定的内核。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悬浮的思想扎根下来，或是在现实中生长出有根的思想。

注1：学生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种实践，一来是因为这些学生是“准知识分子”而非学者，与平民的距离本身就比较接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高高在上。二来比如，他们已经有了“平民夜校”的实践：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因此也取得了许多扎实的平等及双

向沟通的经验。三来，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深厚思想与经验资源，譬如无政府主义的工读互助构思及互助精神都是思想上的资源，而演讲团所持的以促进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交流的识字课本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所以编辑的。

参考文献

Arif Dirlik (1986) 《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

(朱志敏译、高力克校)，载《民国》第13卷第1号。

Jerome B. Grieder (1972/1989) 《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韩红译、王跃校)，收《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 (1918/1997) 《劳工神圣》，收《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另见

<https://new.qq.com/omn/20171127/20171127B0Y26N.html>

贺照田 (2016)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收《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

汪晖 (1989) 《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第3期。